

Globethics Repository



神學論題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C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21 00:09:4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71

神學論題

啟示與哲學的政治衝突

任何教書先生都有一群學生，但大多教書先生傳授的是書本知識而非精神；即便傳授的是精神，能否在社會思想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又是另一回事。施特勞斯 (Leo Strauss) 堪稱二十世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絕不多見的影響時代精神的教書先生，他傳授的是一種可名為慎微的精神氣質以及看書的眼力，而不是單純的書本知識 (包括他自己寫的)。施特勞斯喜歡同自己的學生一起吃飯、飲咖啡時談哲學，建立親密的師生關係。任何一個教授都可以，事實上也確有不少教授這樣做，但不一定會建立起師生間的精神崇拜關係。他的學生堅定、熱情地傳揚他的精神氣質，或者在政治實踐中貫徹他的精神。施特勞斯對北美學界精神氛圍的影響，被 Gordon S. Wood 這樣的美國歷史家描述為本世紀美國最大的學院運動，被及思想史、文學批評、古典學、宗教研究、美國史和美國憲政史等領域。至於政界方面，《紐約時報》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的一篇題為「請問誰擁有權力？」的署名文章稱，「晚期施特勞斯也許是當今美國政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

施特勞斯的門徒主要是他在芝加哥大學任政治哲學教授近二十年 (1949-1967) 間形成的，大致可以分為兩撥人：在美國和加拿大許多大學執教的昔日學生和在白宮幹政治

或在共和黨從政的政治家。哪些是在北美佔領了諸多大學的施特勞斯門徒？據說，看看施特勞斯同其親密助手Joseph Cropsey合編的《政治哲學史》（中譯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中的三十來位作者，就清楚了。學院中的施特勞斯門徒還辦了一份刊物*Interpretation*，按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解釋學探究西方思想史，間或刊佈宗師的未刊講稿，澄清宗師同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大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洛維特（Karl Löwith）、施米特（Carl Schmitt）、沃格林（Eric Voegelin）、阿倫特（Hannah Arendt）等人的關係。至於政治高層中的門徒，則是列根和布殊執政時期執掌白宮一些部門關鍵的人物，包括駐外大使、國防部長秘書、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國務秘書助理、最高法院法官以及教育部高官等等。據Stephen Toulmin說，他們精通施特勞斯的論著勝於了解國際一國內的政治事務。共和黨失去政權後，這些施特勞斯門徒繼續在共和黨內發揮重大作用。一九九四年共和黨提出「與美國重訂契約」的政治綱領，施特勞斯被尊為思想教父。

作為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並沒有提出什麼「主義」論述供人使用，其一生學術主要在詮釋西方近代、中古中期和古希臘的哲學，很少論及現代哲學家或提出自己的「第一哲學」。然而，施特勞斯通過解釋思想史，不僅成為海德格爾之後最重要的釋義學大師，而且成為當今真正達到述而不作這一最高哲人典範的「第一哲學」人。

理性與啟示的政治衝突僅是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思想中的一個論題，要理解這一論題的含義，需要對其思想的整體有所認識。劉小楓的論文從思考科耶夫的說法「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神學」入手，討論施特勞斯和伯林對「人類

不可解決的問題」的不同理解，探索施特勞斯思想的政治—神學含義。隨後是施特勞斯的四篇論文：〈耶路撒冷與雅典——一些初步的反思〉從解釋《創世記》頭兩章入手，論析《聖經》啟示與希臘哲學的政治差異；〈神學與哲學的相互影響〉則試圖說明，哲學理性與《聖經》啟示的衝突既無法消除、也不可解決，相互都駁不倒對方，但這種衝突恰恰是西方精神的活力所在；〈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紀哲學〉提出理解中世紀思想——理性與啟示衝突的古典時代——的解釋原則，不僅對理解中世紀思想有效，對理解所有古代思想同樣有效。〈顯白的教誨〉一文具體討論了西方思想傳統中的「隱微論」和「顯白論」，揭示了精神的政治衝突的普遍含義以及啟蒙運動如何企圖抹去這一人類普遍的衝突。Gunnell的〈理性、啟示和自然——施特勞斯主義之前的施特勞斯〉論述了施特勞斯的早期思想經歷，對於了解其思想中啟示與哲學的衝突這一問題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

從拉丁教父德爾圖良反對希臘教父調和基督信仰與柏拉圖主義、強硬地主張「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後，理性與啟示的衝突就成了西方思想的結構性因素。早期經院神學（安瑟倫）到當今現代之後的神學——無論天主教還是新教神學，都沒有擺脫理性與啟示的衝突。施特勞斯並非從傳統的哲學認識論或基督教神學、而是從政治哲學來解釋理性與啟示的衝突。理解施特勞斯的這一視角，對漢語思想學界可能具有未可估量的意義。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